

19 世紀俄國漢學大師巴拉第的生平及學術

The Life and Academic Work of the Great Russian Sinologist Palladius (P. I. Kafarov)
in the 19th Century

陳開科 (Chen Kailkel) *

卡法羅夫 (П. И. Кафаров, 1817-1878)，教名巴拉第 (Палладий, Archimandrite Palladius)，出身於喀山州一個神學世家，畢業於當地宗教學校。按一般規律，他必定會成為成千上百神父中的一位，默默無聞。可是在他 22 歲那年，也就是 1839 年，他突發奇想申請去遙遠的中國服務，自願參加俄國駐北京佈道團，成為第 12 屆佈道團成員，從此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他先後三次到達北京，居住時間長達 31 年。¹他和遙遠的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結下了千絲萬縷的聯繫，成為世界公認的著名漢學家。當代俄羅斯漢學家，霍赫洛夫 (А. Н. Хохлов)，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研究員評論說：「他是俄羅斯漢學科學大師之一，他寫了許多有關中國、中亞及遠東的歷史、地理和民族文化方面的著作。在東方學領域裏，他的知識是百科全書式的，科學興趣表現得非常廣泛，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國外，他都是當之無愧的權威，因此，在他那個時代，他被公認為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²而現代俄羅斯漢學界，則習慣將他和比丘林 (Н. Я. Бичурин, 1777-1853)、瓦西裏耶夫 (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 並列稱為「俄羅斯漢學界三大巨匠」。³以下簡單地描畫這位傑出漢學家一生的生活和科學活動的軌跡。

一、志願去遙遠的中國：巴拉第的早年生活

有關巴拉第早年的情況，保存的史料不是太多，只能大致地描述。巴拉第於 1817 年 9 月 16 日出生在喀山州契斯托波爾斯克縣斯塔爾舍施明斯克鎮郊一個大司祭家庭。⁴根據檔案資料的記載，他出身神學世家，其祖父是神父，其父伊萬畢業於喀山神學院，後來做了斯塔爾舍施明斯克的博戈雅夫列斯基大教堂的神父，⁵ 1806 年被委任為契斯托波爾斯克縣的監督司祭，1807 年又升為博戈雅夫列斯基大教堂的大司祭，管理兩個古老的鄉村教堂。⁶至於巴拉第的母親瑪麗婭，她忙碌一生，除了輔助丈夫，承擔所有家務外，全部精力都用在教育孩子們身上。據資料記載，她一共養育了 9 個孩子。巴拉

* 作者為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 1 П.Е.斯卡奇科夫認為巴拉第在北京居住了 33 年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 151)；列舍托夫也持這種觀點 (С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М., 1997. С. 289)；俄羅斯科學院的佈道團歷史專家伊芭多娃認為巴拉第在北京居住時間為 30 年左右 (См.: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 275-ле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СПб. 1993. С. 112.)。這比較符合實際，具體時間應該是 31 年。
- 2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 1979. Ч. I. С. 3.
- 3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М., 1990. С. 90.
- 4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 (喀山)，全宗 7，目錄 54，案卷 2 (1817 年)「契斯托波爾市及契斯托波爾斯基縣的婚喪登記冊」。
- 5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 (喀山)，全宗 7，目錄 62，案卷 4 (1825 年)，頁 9；全宗 7，目錄 66，案卷 3 (1829 年)，頁 11。
- 6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 (喀山)，全宗 7，目錄 64，案卷 3 (1827 年)，頁 9。

第有兩個哥哥、三個姐姐還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⁷我們可以想像，要把這麼多兒女養育成人，對她來說是多麼地艱難。由於母親的精心教育，巴拉第剛滿8歲，就開始寫作和閱讀。⁸優良的家教，對以後這位漢學巨頭的傑出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作為神學世家，巴拉第兄弟都受到了嚴格的神學教育。大哥亞歷山大（Александр）走上了父親的生活道路，喀山宗教學校畢業後，1855年就接替父親工作了40年的崗位，做了契斯托波爾斯克縣的監督司祭。⁹而二哥尼古拉（Николай）也於1836年畢業於喀山宗教學校，隨後任契斯托波爾斯克縣色捷林基洛鎮的神父。¹⁰而他的一位姐姐伊麗莎白（Елизавета）也嫁給了一位神父。¹¹這種嚴格及很有特色的神學世家的特殊生活環境，對巴拉第後來的生活道路起了決定作用。

和其兄長們一樣，巴拉第於1827年進入契斯托波爾斯克縣神學學校接受啓蒙教育。¹²他學習非常努力，成績很好。¹³1832年15歲的巴拉第從神學學校畢業，旋即進入喀山宗教學校，¹⁴他以自己的萬分勤勉和溫和性格贏得了老師的注意，¹⁵從1834-1836年度的考試結果證明巴拉第的學習非常成功，古代歐洲語、古希臘語和古法語等外語考試都是高分。¹⁶

儘管是宗教學校，但是課程內容仍然相當重視歷

史。早在1832年巴拉第就已經學完了歷史教程。這個教程有一個簡短的序言，闡述了「歷史概念」、「歷史對上帝意識，對敬仰上帝，對人的意識的好處和樂趣」、「有關希臘歷史的章節與計畫：希臘人的起源，希臘德弗卡里昂的產生」、「費弗斯基王朝的基礎」等。¹⁷宗教學校不但開了歷史課程，而且還講述了俄羅斯國家的歷史及其與亞洲鄰邦的關係，聽了這些課程後不僅僅是巴拉第，其他的學員也都激動不已。這些授課教師，如瓦·阿·斯伯耶夫（В. А. Сбоев）¹⁸、維·彼·韋氏涅夫斯基（В. П. Вишневецкий），都是比丘林所熟知的，也是宗教學校的學生所尊敬的人物。韋氏涅夫斯基同時管理圖書館，1847年11月，比丘林還把自己剛出版的《中國的道德與公民狀況》送給了他。¹⁹這些史料對我們研究巴拉第後來申請去中國的動機很有啓發。且不論宗教學校開了有關俄國與東方，包括中國的關係的課程，更重要地，這些最令學生尊敬的老師們都和因中國而成名的比丘林有相當好的關係。他們和比丘林的密切的學術關係，勢必對學生產生深刻的影響。

1837年巴拉第進入聖彼得堡神學院深造，²⁰1838年畢業後被錄用到神學院管理委員會外事辦公室任文牘秘書。²¹以當時的情況，這等於在他面前展開了一條神學部門的升官之道。然出乎意料的是，辦公室的工作很快

7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7，目錄54，案卷3（1817年），№32，頁1005。

8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7，目錄62，案卷4（1825年），頁9。

9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4，目錄62，案卷2（1830年），頁17；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I-5（1823年），目錄34，案卷II，第1部分，頁215、324。

10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4，目錄68，案卷126，№24（1836年12月13日）；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I-5（1840年），目錄34，案卷II，第1部分，頁215。

11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7，目錄66，案卷3（1829年），頁16。

12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7，目錄64，案卷3（1827年），頁9。

13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116，目錄1，案卷120（1827年），頁358-359。

14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116，目錄1，案卷127，頁51。

15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116，目錄1，案卷143，頁86。

16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116，目錄1，案卷171，頁52。

17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116，目錄1，案卷127，頁1、9、16。

18 國立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手稿部，全宗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A-27-6-H.Я.比丘林通訊錄。

19 這本附有H. Я. 比丘林親筆題詞（1847年11月30日）的書，藏於國立中央古代文獻檔案館圖書館（莫斯科）。書裏還蓋有俄羅斯外交部莫斯科主要檔案館的橢圓形印章。

20 韃靼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國立中央檔案館（喀山），全宗116，目錄1，案卷101，頁16。

21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私人檔案總匯和庶務檔案，目錄464/3，案卷823，頁1-4。

使巴拉第厭煩了。不久，他給正教事務衙門遞交了請求書，要求把他列入將被派往北京的佈道團。1839年8月2日請求被批准，當日就剃度為僧，法號「巴拉第」。從此巴拉第與中國及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巴拉第做出這樣的決定？當代研究俄羅斯漢學發展歷史很有成就的霍赫洛夫教授說：「至於促使巴拉第走上這一步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是拮据的經濟狀況，還是失敗的愛情，抑或是渴求通曉東方民族生活的知識呢，很難說」。²²就日前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來說，確實很難搞清楚其中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因為巴拉第自己從沒有在日記或信件中談到過這類問題。就霍赫洛夫所列舉的三方面原因來說，至少第一點是靠不住的。因為沒有任何資料證明其家庭很困難，或者作為神學院文牘秘書，其經濟收入不敷支出；至於「失敗的愛情」倒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經和旅居義大利的女藝術家索·蘇哈沃·卡貝麗娜（С. В. Сухово-Кобылина）的妹妹有過一段失敗的愛情。1860年他受命去羅馬附屬俄羅斯使館的東正教堂做神父時，曾和索·蘇哈沃·卡貝麗娜相遇。「在到羅馬居住近四年之後，巴拉第認識和接近了許多傑出的俄羅斯知名藝術家，……其中和天才風景畫家索·蘇哈沃·卡貝麗娜的友誼最為密切……巴拉第非常密切地關注她的事情，總在她艱難的時刻幫助她。儘管他曾與她的一個姐妹戀愛無望，但他仍然把她日常生活的不順和失算，當成自己的私事來承擔。」²³1865年7月31日他出任俄羅斯駐北京第15屆佈道團首腦時，曾給索·蘇哈沃·卡貝麗娜寫過信，其中說：「很久以前，您，善良的索非婭·瓦西裏耶夫娜，曾經因我不可原諒的沈默而譴責過我。……您現在在哪？……沒有和您的姐妹在一塊嗎？對她我是絕對有愧的。請她原諒我，之前我沒有親筆給他寫過什麼，我

很愧疚」。²⁴但這段愛情為何失敗，及其對巴拉第產生了何種影響，我們仍然無法估量；至於「渴求通曉東方民族生活的知識」，客觀上確實存在。「如果談到渴求周圍世界的知識，當時青年學生都對東方國家的興趣很濃厚」。²⁵這點我們可以從巴拉第的好朋友戈爾斯基（В. В. Горский, 1819-1847）給其父母所寫的信件中得到佐證。信中說：「我實話對你們說，吸引我到那裏去的原因是對知識的渴望，在那裏能發現最豐富、最取之不盡、最傑出的知識，而這在其他世界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渴求東方的知識，僅僅是事情的一面，一般來說，都伴隨著另一面，那就是世俗的功利心。戈爾斯基接著寫道：「吸引我到那裏去還有對成名的渴望，中國，是獲得名聲的最佳途徑」。²⁶這方面的原動力，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比丘林，他作為一個默默無聞的教堂執事的兒子，成了俄羅斯乃至世界聞名的學者，這感染並鼓舞了許多人。戈爾斯基又在另一封信中寫道：「比丘林通過研究中國文學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他是倫敦和巴黎亞洲協會的名譽成員」。²⁷但是，從後來我們所熟知的巴拉第的生活品格看，這種功利心不可能給他去中國的動力。瓦西裏耶夫曾在日記中寫道：「巴拉第神父和我相交多年，他連虛偽的影子都看不到」。²⁸1867年貝勒士奈德（Э. С. Брегшнейдер）寫信給奧斯汀·薩克恩（Ф. Остен-Сакен）也說：「我不打算囉唆他作為一個人和學者的高尚品格，在北京，所有的歐洲人，中國人都對他懷有深深的敬意」。²⁹連以性格乖戾著稱的第12屆佈道團首腦圖卡列諾夫（П. Тугаринов）也寫道：「他安靜，溫柔，隨和……在四年多的北京生活期間，我從沒有聽說過他有一次，和自己的同事們相處時哪怕是幾分鐘的不和睦，或者是做出任何有失分寸的事情。……這使他獲得了最高的評價及各種榮耀

22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Ч. II. С. 11.

23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Ч. I. С. 69.

24 國立列寧圖書館，全宗 223，第 20 盒，第 4 保存單元，頁 10-11。

25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Ч. I. С. 11.

26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97. № 5. С. 232.

27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97. № 5. С. 228-229.

28 П. Е. Скачков. Академик В. П. Васильев о П. И. Кафарове. См.: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 № IV. С. 208.

29 Известия Имп.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ИРГО). 8 мая 1868. № 1. С. 25.

……」。³⁰很難想像具備這樣衆口倍稱的高尚品德的人會受到功利心的引誘。

從巴拉第學習和成長的過程看，我們認為有兩個因素或許堅定了他申請去遙遠中國的願望。一方面，他在喀山宗教學校學習時，不但該校專門設有關於俄國和東方的關係的課程，而且該校的許多德高望重的老師，和當時俄國駐北京佈道團的一些成員，如比丘林有密切的聯繫。這些課程的開設，爲他進行了有關東方知識的啓蒙，而這些老師和北京佈道團成員的聯繫則引起了他們對中國的嚮往。尤其是被委任爲 12 屆北京佈道團首腦的圖卡列諾夫，剛從北京回國，於 1838 年 1 月進入聖彼得堡神學院攻讀碩士學位，而當時巴拉第也正在那裏學習和工作。如此一來，他自然就成了第 12 屆佈道團首腦的熟人和同事。這樣，巴拉第就完全具有了申請去中國的關係和知識契機。後來，第 13 屆俄國駐北京佈道團的大部分成員都來源於聖彼得堡神學院；³¹另一方面長期宗教學校的規範保守的學習生活，³²再加上神學院文牘秘書工作的枯燥，使巴拉第透不過氣來。要擺脫這些，去遙遠的中國，對當時的巴拉第來說，恐怕是爲數不多的出路之一。

不管動機如何，從此巴拉第開始和遙遠的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開始了他獨特的轟轟烈烈的新生活。

二、三十年砥礪京華，功成名就

從 1839 年到 1878 年，約四十多年裏，巴拉第先後三次旅居中國北京，在北京生活達 31 年之久。以下對他在北京的生活和科學活動進行簡單的描述。

1840 年 1 月 19 日巴拉第作爲第 12 屆俄國駐北京佈

道團的修士輔祭，離開喀山踏上了去中國的征途，³³ 1840 年 10 月 4 日到達北京。³⁴ 此後，直到 1847 年 4 月 27 日離開北京回國，³⁵ 期間在北京生活了 7 年，這是他第一次在北京生活。在這段時間裏，巴拉第作爲一般神職人員，主要工作是學習語言；其次是研讀和研究佛教典籍，並寫了幾種出色的佛教著作，在漢學研究領域展示了其出衆的才華。

一般來說，佈道團成員的首要任務就是學習語言。巴拉第則主要學習了漢語。事實上，新佈道團成員們的漢語教育早在聖彼得堡時就已經開始了。³⁶ 1840 年 2 月新教團經過艱難跋涉，來到伊爾庫茨克，在這裏「趁爲經過恰克圖以及以後經蒙古到北京的準備時間，巴拉第借助於瓦西裏耶夫的幫助，熟悉了蒙古語和藏語。到達恰克圖之後，語言課繼續開，但老師則換成了在恰克圖語言學校教漢語的克雷門斯基（К. Крымский, 1800-1861）。這個學校是 1835 年 5 月在比丘林的直接參與促進下創辦的」。³⁷ 可見就算在艱難的跋涉途中，他們也沒有停止學習。到達北京之後「新教士開始了非常單調的日常生活，即在聘請的漢語教師『先生』的指導下，完成每天的語言課程。……教士們的日常生活照舊，沒有增添一點新東西」。³⁸ 也許正是這種單調、嚴肅的學習生活氣氛，導致這一屆佈道團的漢學研究成績斐然，誕生了巴拉第和瓦西裏耶夫兩位世界級漢學泰斗。

語言學習很快就結束了，巴拉第完全掌握了漢語，由於勤奮，他很快在漢學研究領域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由於當時佈道團有研究佛教的傳統，加上資料充足，³⁹ 當然也不排除爲了傳播東正教而瞭解異教的因素，巴拉第在這個時期的漢學研究興趣及成就主要集中在佛教方面。1843 年，巴拉第完成了第一篇作品〈中國

30 Записки Имп.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общей географии. Т. 22, №1. СПб., 1892.

31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1979. Ч. II. С. 11.

32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1979. Ч. I. С. 9.

33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98. № 1. С. 93.

34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1979. Ч. I. С. 15.

35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р. cit. 1977. С. 154.

36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1979. Ч. I. С. 12.

37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1979. Ч. I. С. 13.

38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Ч. I. С. 15.

39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Ч. I. С. 17.

佛教諸神及他們的畫像記要》，詳細地編輯了佛教最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神祇清單，並附上有價值的插圖收藏品。⁴⁰ 1844年巴拉第又完成了有關佛教的新著《迦毗羅學說》。該著作分為：前言、《丹珠爾》中的一篇專題論文〈金七十論〉譯文兩個部分。這些作品在送達亞洲司之後，「切斯諾伊（А. Честной, 1801-1866）和比丘林參與了對它的評論，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⁴¹ 可惜一直是手稿，並沒有出版。

1847年巴拉第完成另外兩部作品《佛陀的生活》和《古代佛教史綱》，發表在他自己主編的《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作集》第1、2輯中，是真正代表巴拉第的佛教研究水平的作品。它們表明巴拉第研究佛教是有計畫地，不是盲目的。按照近代佛學大師呂澂的看法，如果要有計畫地研究佛教，就必遵一定順序。首先是「藏經」，也就是材料研究；其次是「佛傳」，也就是佛教創立者的傳記研究；再次是「教史」，也就是佛教傳播史的研究；最後是「佛理」，也就是佛教宗教哲學理論的研究。⁴² 而巴拉第正是依照這樣的歷程來研究佛教的。首先在北京居住的第一個時期，他除了全力學習漢語外，所有剩下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閱讀佛經上。當時佈道團大司祭，佛教研究專家圖伽利諾夫在給亞洲司的報告裏就說：「巴拉第以少有的熱情，堅定不移地沈入佛教的漩渦之中。從早到晚，坐在佛經面前，抄著，譯著……」。⁴³ 根據瓦西裏耶夫院士的回憶，巴拉第「閱讀了750多卷的漢文佛經後，在臨回國前夕，放棄了佛教研究，把所有的手稿摘錄全部贈送給了我，至今它們還保存在我這裏」。⁴⁴ 他在北京的幾年就熟讀了750多卷佛經，這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心；接著寫了《佛陀傳》，又寫了《古代佛教歷史綱要》。按理，接著就是研究佛教教理。可惜，由於沙俄政府的指令，以

及與滿清學者何秋濤的交往，⁴⁵ 巴拉第的學術興趣產生了變化，從第二次到達北京開始，轉而研究中國西北邊疆史地學。雖然他的佛教研究沒有繼續，但是，從他研究佛教的歷程可以看出是有計畫的行為，而且符合佛教研究的學術邏輯。在他的著述中，到處顯露精闢獨到之見。因此當時圖卡利諾夫對巴拉第佛教著作的學術水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在給亞洲司的報告裏就說：「有關佛教部分的著作中最優秀的作品當然是巴拉第的作品。在他的文章中，新資訊是那樣多，這些在所有同時代歐洲人的佛教著作中是絕對找不到的……」。⁴⁶ 不過，在俄羅斯本土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在佛教研究領域提倡研究資料的梵語原典化和研究方法的西方化，這樣勢必就導致巴拉第佛教研究傳統風格的被冷落。

由於巴拉第的傑出表現，1847年4月俄羅斯外交部亞洲司命令他回國，並委託他組建新一屆佈道團。1849年2月初，巴拉第作為首腦率領第13屆佈道團的9名成員（在伊爾庫茨克又加上涅恰耶夫（Н. Нечаяев）），⁴⁷ 從喀山出發，於1849年9月27日到達北京，直到1859年5月離開中國止，在北京共居住十年。這是他第二次在北京居住的時期。

這個時期正值中國發生一系列政治變動：太平天國起義，第二次鴉片戰爭等等。由於受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佈道團主要使命的制約，巴拉第合乎邏輯地扮演了配合侵略者的角色，其活動的中心是外交政治。至於學術興趣則由佛教研究變為關注俄中之間，如蒙古，中亞等地區歷史地理的研究。就其成果來說，主要是充當科學研究的組織者，主編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作集》前3輯。

巴拉第作為傑出的科學研究組織者，主要表現在：首先是斯卡奇科夫（К. А. Скачков, 1821-1883）

40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1-5，1823 年，案卷 1，卷夾 4。

41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Ч. I. С. 20.

42 呂澂，《佛教研究法》（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 年），頁 1-2。

43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1-5，1823 年，案卷 1，卷夾 23，頁 4。

44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М., 1958. Вып. 4. С. 208.

45 參見陳開科，〈巴拉第與滿清西北邊疆史地學家的學術因緣〉，《西域文史論叢》，2006 年第 1 輯，頁 78-92。

46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1-5，1823 年，案卷 1，卷夾 23，頁 3。

47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1-5，1823 年，案卷 1，卷夾 30，頁 32；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私人檔案總匯和庶務檔案，履歷表，案卷 2403，目錄 464，頁 1-2。

的天文和農業研究取得很大成就。斯卡奇科夫在佈道團歷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既是漢學家，又是外交家；既是學者，又是藏書家。所以，蔡鴻生教授稱之為「兩棲人物」。⁴⁸事實上，他的成功離不開巴拉第的無私幫助。首先，他的漢語學習得到了巴拉第的幫助：「注意到斯卡奇科夫研究的很多生動特點，巴拉第不僅破費為他聘請中國老師，而且還親自幫助他解決一些很難讀懂的中文字難點」。⁴⁹1851年12月7日，斯卡奇科夫在自己的日記裏寫道：「整個一星期都和巴拉第在一起工作，兩天在家裏，三天在南館（巴拉第當時住在那裏）。很多修改，從結果看很明顯，我……一年所獲不少」；⁵⁰另外斯卡奇科夫先期賴以工作的北京天文臺，就是在巴拉第的直接干預下圓滿建成的，⁵¹還附帶管理雅克薩中等專業學校；⁵²巴拉第還帶他到了北京郊區，瞭解中國的農業耕作和棉花種植等實踐情況，並且斯卡奇科夫在自己的實驗地裏種植各種穀類、蔬菜和園藝作物，⁵³還根據巴拉第的建議選擇那些能使俄羅斯農藝師和育種家們感興趣的作物的種子，以便在俄羅斯推廣。⁵⁴

其次，這個時期巴拉第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主編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作集》第1輯（1852年出版），第2輯（1855年出版）和第3輯（1857年出版）。這是十月革命前俄羅斯唯一的一份漢學連續期刊。雖然只出了4輯（其中第4輯於1866年出版），但是，它的影響卻是國際性的。4輯共收論著和譯作28篇，「涉及的範圍極廣，包括國計民生，宗教信仰，物

產交通和風土人情等」。⁵⁵前3輯問世後，德國人卡爾·阿伯爾（Carl Abel）博士與弗·阿·梅克倫堡（F. A. Mecklenburg）選擇地將之譯成德文，於1858年在柏林發行。其中德文譯本第1輯中所譯原載俄文本第3輯之〈關於鈔法的會奏〉一文，被馬克思注意到，後來在其《資本論》第1卷第3章「貨幣與商品流通」時，曾有注解涉及此事，而〈關於鈔法的會奏〉中的戶部侍郎王茂蔭就成為馬克思《資本論》中唯一提到的一個中國人了。這也算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罕見盛事罷。

有很多人認為巴拉第在第2次北京居住時期，本人很少作漢學研究，其實這種看法有失偏頗。且不說科學組織者的重要性，單說其個人的漢學研究，也不完全是空白。首先據俄羅斯學者的考證：「由於1847年（巴拉第）從滿清歷史學家何秋濤手中獲得了最完整的有關《蒙古秘史》方面的著作，因此，俄羅斯學者也開始對這樣複雜的課題進行研究」。⁵⁶這種說法是完全合理的。雖然有關《蒙古秘史》的譯著最後發表於1866年，但是，譯註一定開始於1847年以後，也就是他在北京居住的第二個時期。有確切史料記載的是，早在組建第13屆佈道團時期，「1848年6月，巴拉第翻譯完了魏源在北京1844年出版的歷史著作《聖武記》（《執政王朝的戰爭實錄》）的第1章」。⁵⁷很顯然，翻譯是在亞洲司的委派下進行的，這樣做為的是瞭解中國歷史學家有關俄羅斯的某些言論；⁵⁸此外，巴拉第還積極地翻譯當時中國有關俄中接壤地區的歷史地理學著作。他在50年代初期的報告中從《瀛寰志略》⁵⁹和《守邊輯要》⁶⁰

48 蔡鴻生，《俄羅斯館紀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57。

49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 Ч. I. С. 34.

50 國立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全宗273，第2存盒，第2保存單元，頁65。

51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огвестник. 1916年，第5-6期，頁20。

52 Е. П.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СПб., 1853. Ч. 2. С. 201-202.

53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1-5，1823年，案卷1，卷夾51，頁372-373。

54 國立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公共圖書館，全宗273，第2存盒，第1保存單元，頁46。

55 同註48，頁111。

56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Ч. I. С. 38.

57 該譯著為手稿。參見：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亞洲司圖書館，目錄505，第81保存單元。

58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1-5，1840-1850年，案卷2，卷夾34，第2部分，頁258。

59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1-5，1823年，案卷1，卷夾51，頁552-555。

60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1-5，1823年，案卷2，卷夾83，頁25-30。

(Шоу бянь цзи яо音譯)中摘錄了很豐富的資料。此外他還發表了〈中國及其藩屬區域內的商路〉⁶¹和〈天津和上海之間的海運〉⁶²兩篇論文。儘管這些著作多半是應時之作，但仍然可以明顯地看到他研究歷史地理學的積極興趣。隨著這種興趣的發展，巴拉第後來在歷史地理學領域裏獲得了重要的成果。最著名的就是對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⁶³中國旅行記的注解。但是由於當時中國發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而作為負有特殊使命的俄羅斯佈道團，客觀上不可能置身事外，尤其是作為大司祭的巴拉第，更是深陷其泥潭中。毫不諱言，這也從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巴拉第的漢學研究成就。

1858年9月28日以卡爾波夫(Карпов Гурий, 1812-1882)為首的第14屆佈道團來到了北京，1859年5月25日巴拉第離開北京回國。這次回國和以前不同的是，由於巴拉第編輯了3輯《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作集》，在俄羅斯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同時，由於他的輔助，使俄羅斯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的政策獲得了巨大成功，所以他獲得了很崇高的聲譽。但是他對這些作了低調處理，沒有利用獲得的聲譽謀求個人利益。稍微休息了一陣，1860年9月7日選擇了一個微不足道的職務，去羅馬隸屬於俄羅斯使館的小小教堂做神父。⁶⁴

從1860年9月到1864年初，他在羅馬居住了差不多4年。期間，他大概除了主持小教堂的教務外，主要是加強了與歐洲學界的聯繫，尤其是結識了一大批旅居國外的俄羅斯先進思想家，乃至力主廢除農奴制的革命家。能「熱情地看待義大利的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德·卡里巴裏季(Д. Гарибальди)的愛國主義活動」，⁶⁵

這說明其思想境界高出同時代的俄羅斯東正教教士。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裏，甚至贊同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Robert Owen)的思想：「我對歐文的思想很贊同……他的很多思想使我想起您的思想，在許多方面與我引起共鳴」。⁶⁶總之，他在羅馬的生活很怡然，應該是他一生中最快樂最輕鬆的一段時間。

在這段時間裏，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漢學。1860年他完成了一篇紀實著作《在北京郊區一寺廟度過的一周》。⁶⁷同時還開始研究中國基督教歷史，以及伊斯蘭教文學等。估計後來發表的有關中國基督教歷史，中國伊斯蘭教文學等作品都完成或構思於這段時期。例如《基督教在中國的古老痕跡》，他除了廣泛利用歐洲文獻外，還利用了29種漢語文獻。但他仍然認為「我所收集的材料不多，遠遠不能滿足對這個課題的系統研究」。⁶⁸由於生活條件的改善，以及快樂與平靜的心靈，巴拉第的腦海裏構思了很龐大的科學研究計畫。他在致外交部奧斯汀、薩克恩(Ф. Р. Остен-Сакен)的信中說：「在我的念頭裏還有許多其他的研究計畫，涉及中國的消遣文學、詩歌、戲劇等等，但是我的所有設想未必能實現」。⁶⁹1866年後他相繼出版的一些有關元史的譯註，也完成於這個時候。有資料證明「還在1864年1月，亞洲司給聖彼得堡書報檢查委員會提交了3份巴拉第的手稿，即：《蒙古關於成吉思汗的古老傳說》(即《蒙古秘史》)、《古代中國關於成吉思汗的傳說》(即《皇元聖武親征錄》)、《長春真人西遊記》」。⁷⁰這三部著作是巴拉第蒙古歷史研究的三部曲，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研究和翻譯這三部漢文蒙古歷史著作的外國人。拿《蒙古秘史》來說，巴拉第為了譯

61 Известия Имп.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ИРГО), Вып.4, 1850. С. 224-259.

62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СПб., 1866. Т. IV. С. 381-392.

63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Палладия Кафарова н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Марко Поло по Северному Китаю. СПб., 1902. См.:

Известия Имп.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38, 1902. С. 1-46.

64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羅馬使館檔案，目錄525а，案卷797，頁2。

65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Ч. I. С. 70.

66 國立列寧圖書館，全宗223，第20盒，第4保存單元，頁18-19。

67 國立中央古代文獻檔案館，全宗1385，目錄1，第1608保存單元，頁4。

68 Восточный сборник. 1872. Т. 1. Вып. 1. С. 47-49А.

69 同註67，頁5。

70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I-5，1823年，案卷I，卷夾74，頁459。

著它，參考了五十多種中、西書籍，做了 660 條註釋。關於其譯著的意義，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著名蒙古學家雅庫博夫斯基（А. Ю. Якубовский）評述道：「根據專家們的推斷，巴拉第的譯註是很出色的，雖然這個譯註不是直接來自蒙語文獻，但是即使在科津（А. Коцин）院士出版了新譯註之後，它仍然不失其意義。像我們下面將要看到的那樣，巴拉第在蒙古學的發展過程中，甚至在蒙古人的歷史文獻學的發展過程中，都起著獨一無二的作用。80 年來，他培育了和正在培育我們的歷史學家，他和拉施特丁（Rashīd al-Dīn Fadl Allah, 1247-1318）的著作，還有漢語著作（如高孟、孟洪或趙洪及其他人的著作）一起，提供一流的材料，特別是蒙古的材料，使我們完全有可能全面弄清有關蒙古帝國的建立情況。在這方面，巴拉第的貢獻是不可限量的」⁷¹ 這種評價是非常中肯的。

1860 年俄國向北京派遣了正式外交使團，佈道團失去了政治職能。1864 年 9 月 10 日受俄羅斯東正教事務委員會的委託，巴拉第身負傳道使命和兩個司祭謝·阿爾塔莫諾夫（С. Артамонов）和格·列文茨基（Г. Левинский）離開聖彼得堡，⁷² 於 1865 年 3 月 25 日第三次到達北京。⁷³ 此後直到 1878 年 10 月 2 日因病前往歐洲止，又在北京居住了 14 年。這是他第三次居住北京的時期。

這個時期，巴拉第「除了管理簡單的教會事務外，就一頭栽進科學研究之中」。⁷⁴ 他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於 1866 年編輯出版了《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作集》第 4 輯。有趣的是，裏面收的 3 篇譯著〈蒙古關於成吉思汗的古老傳說〉（即〈蒙古秘史〉）、〈長春真人西遊記〉和〈中國的穆斯林〉）全是巴拉第一個

人的著作。實際上，這是當時佈道團漢學研究式微的一個表現。在第 15 屆佈道團裏「沒有大學生，沒有畫家，沒有醫生。在所有教士中，漢語過關的只有一個人，就是波利金（И. Поликин）」。⁷⁵ 新佈道團雖然仍受到教會的重視，但是卻成了政治上的昨日黃花。沙俄政府不再特別關注它，它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湧現出那麼多漢學研究人才了。既然沒有其他著作可以刊登，也就只好他自己一個人承包了。關於《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作集》第 4 輯中巴拉第的 3 篇著作，當時的俄羅斯漢學家格裏戈里耶夫（В. Григорьев）進行了高度評價：「……之前在歐洲聞所未聞。……在目前情況下，它是我們有關蒙古知識方面最傑出的著作。……沒有一個歐洲漢學家不為此而感動」。⁷⁶ 可見，從《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佈道團成員著作集》的編輯開始，巴拉第在俄羅斯漢學家眼裏，已經具有了歐洲意義。巴拉第已不僅僅是一個傑出的俄羅斯漢學家了，他已經成為國際傑出的漢學家了。

當然，這個時期最引人注目的一項科研工作就是實地民族調查。「1869 年，俄羅斯皇家地理學會向正教事務衙門請求允許巴拉第去南烏蘇裏邊區出差，調查黑龍江，特別是南烏蘇裏邊區和滿洲，朝鮮邊界地帶所居住的異族人情況，並探索各種留存的古跡（古城、遺址、堡壘等遺跡）」，⁷⁷ 考察工作進行了將近一年。在充分收集材料的基礎上，他寫了一系列內容豐富的報告，對邊區過去的歷史和現狀提出了很重要的看法。這就是後來發表的〈烏蘇裏的蠻子〉⁷⁸ 和〈與滿洲里歷史相聯繫的烏蘇裏邊區歷史概要〉⁷⁹ 以及〈南烏蘇裏地區的民族學考察（信件）〉。⁸⁰ 由於這些考察著作的科學價值，

71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М., 1953. С. 61.

72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IV-2，1864-1865 年，案卷 9，頁 43。

73 同註 67，頁 12。

74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Пекин, 1916. С. 155.

75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р. cit. С. 176.

76 Известия Имп.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66. Т. 11, Вып. 5 (03.10.1866.). С. 157-161.

77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Р. cit.

78 Известия Имп.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71. Т. 7. Ч. 2. С. 369-386.

79 Известия Имп.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79. Т. 8. Ч. 2. С. 1-64.

80 Известия Имп.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70. Т. 6. С. 176-178, 233-238; 1871., Т. 7. С. 91-97, 123-124, 263, 325-327, 355-357, 369-377.

所以，俄國皇家地理學會授予他金質獎章，以茲表彰。⁸¹

從南烏蘇裏邊區考察回來後，巴拉第繼續翻譯研究伊斯蘭教文獻。大概後來出版的《中國伊斯蘭教的漢文文獻》⁸²就是這段時期的作品。有資料表明，這部作品開始鮮為人知，後來被教會史學家阿多拉茨基（Н. Адоратский）於北京佈道團檔案館發現，⁸³在 E. 貝勒士奈德（E. Бретшнейдер 1833-1901）醫生的幫助下於 1887 年出版於聖彼得堡。「在巴拉第所熟悉的 30 種漢語伊斯蘭教文獻中，巴拉第就使用了 25 種。在該領域，巴拉第的著作是最卓越的」。⁸⁴關於伊斯蘭教，巴拉第還有〈中國的穆斯林〉⁸⁵和〈中國伊斯蘭教文獻：對中國伊斯蘭教徒劉澤亮編譯的漢文伊斯蘭教文集《御覽至聖實錄》的簡介〉⁸⁶兩篇文章。

不過，這個時期巴拉第最出色的成就是其編著的《漢俄合璧韻編》。這部詞典是他完成了南烏蘇裏邊區的考察之後開始編著的，直到 1878 年病重逝世為止，前後花了約 8 年時間。⁸⁷遺憾的是，這部巨著在他生前來不及正式出版。原因大致不出兩個方面：一是經費問題；二是詞典還需要修訂，而巴拉第已經病重，無法完成校訂工作。後來這兩個問題都由波波夫（П. С. Попов, 1842-1913）解決。波波夫是巴拉第最親密的同事，也是著名漢學家，時任俄羅斯駐北京使團的一等翻譯。他前後花了 6 年時間，校訂修改了這部詞典手稿。1886 年 3 月，他給老朋友，時任俄國外交部副部長的弗拉卡林（А. Влагалин）提交了一個有關滿清政府政治的報

告。其中特別提出請求撥款將詞典出版。⁸⁸1886 年 7 月，沙皇亞歷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批准了也的請求。當時這個解決經費問題的決定來之不易，因為剛剛經過克裏木戰爭（1853-1856），俄國國庫空虛，沙皇之所以批准撥款，主要原因在於，俄國政府特別是外交部希望出版這部詞典「能夠對加強西伯利亞與中國的關係有利，滿足翻譯者們的需求」。⁸⁹由於當時皇家聖彼得堡科學院印刷廠沒有足夠的漢字活字，所以，波波夫採納他的老師——美國傳教士丁韞良（W. A. Martin）的建議，決定在北京同文館印刷。⁹⁰經過很多人的努力，詞典於 1888 年出版。紅色精裝，扉頁寫著「掌院修士巴拉第遺篇，象胥上士柏百福補譯，素食塾人李壽軒，金台業儒甄雲甫參校」。共分兩卷，上卷 628 頁，下卷 666 + 69 頁。對於這部詞典，當時國際學術界評價很高。傑出的美國漢學家丁韞良在《中國時報》上對此發表評論，其中寫道：「今年，在俄羅斯漢學史上，因出版了傑出的著作而令人稱道。著名的學者，他的名字寫在這本著作扉頁上，排在第一，他把自己生命的最後八年都獻給了它，獻給了科學……雖然詞典，照往常的慣例，生命不會很長久，但未必很快就被超越和被忘卻」。⁹¹據蘇聯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院士說，法國的漢學家沙畹（E. Chavannes, 1865-1918）特別看重巴拉第的這部詞典，認為當漢語詞典不能幫助時，這部詞典常常是「最終的論據」。⁹²

81 П. И. 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 Ч. I, С. 75.

82 П. И. Кафаров.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агометан. СПб., 1887.

83 Op. cit.

84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 177

85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СПб., 1866. Т. IV. С. 437-461.

86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агометан. Изложение содержания магометанского сочинения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под заглавием "Юй лань чжи шен шилу", составленное китайским мусульманином Лю Цзелянь. См.: Труды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а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77. Т. 17, С. 453-460.

87 蘇聯國立中央文學藝術檔案館，全宗 381，目錄 1，第 43 保存單元，頁 10。

88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中國檔案，1872-1879 年，案卷 1912，頁 2-3。

89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 II-11，1886-1887 年，案卷 I，頁 2。

90 Китайское озыкознание. VI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6. С. 158.

91 W. A. Martin. *Palladius and Popoff's dictionary*, Chinese times, Aug. 10. 1889.

92 В. М. Алексеев. 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М., 1958. С. 288.

1860年以後，雖然佈道團的性質已經回歸，非神職人員的派遣已經不再，佈道團漢學研究漸趨式微，但是，佈道團歷史上所形成的東方語言學習，尤其是漢語學習傳統仍然延續著。而巴拉第仍然一如既往，關懷屬下的語言學習，給予無私幫助。關於這一點，只要看看他寫給到達北京後開始研究朝鮮歷史的德米特裏耶夫斯基（А. Дмитриевский）的便條就會明白。便條這樣寫道：「現在我把您的翻譯習作退還給您，我寄給您一本古代朝鮮歷史摘錄，以代替各種意見；把它跟您的譯文擺在一起，就像修正液，不是很方便嗎？當您不需要時，請將它完璧歸趙」⁹³至於與朝鮮讀物有關的中國城市的名稱及其他，最好是從我這裏熟悉它們，否則勢必作無休止的解釋。歡迎您白天到我這裏來，我們會在很短的時間裏使事情成為另一個樣子」。⁹³這種關心後輩的心懷，無疑是前輩學者的一種令人尊敬的風範。作為真正的科學熱愛者，巴拉第沒有一絲一毫的妒嫉心。1875年5月7日，他給離任的俄羅斯駐北京的公使弗拉卡林（А. Влагалин）寫信說：「您關於雜哈羅夫（И. И. Захаров, 1814-1885）的消息使我很高興，他主要研究中亞的歷史與民族學；關於這些問題的最重要的資料他都已經具有了，但沒有沾染現代實用主義的習氣。順便提一下，您為什麼不勸說雜哈羅夫到巴黎去一趟，去東方研究所翻閱他所缺乏的文獻《圖書集成》。他正等著從北京弄來《圖書集成》……可以告知這些文典（7卷或套）即將在聖彼得堡付印」。⁹⁴正因為他具備這樣

的高風亮節，所以生前死後都備受褒贊。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個時期巴拉第不可避免地要把一部分精力集中到教務方面。他要組織佈道團人馬把東正教文獻翻譯成漢語，在某種程度上《漢俄合璧韻編》就是為了這種翻譯的便利而編的。但是，他在教務方面最大的貢獻是培養當地中國人為神職人員。其中有一個叫季純（Цзи Чунь的音譯）的年輕人，後來於1882年成為第一個中國人東正教神父。⁹⁵這為後來東正教成分的中國化打下了基礎，十分有益於東正教融入中國社會。

1878年中葉，巴拉第為詞典的最後竣工費盡心力，這回真的病了。根據醫生的建議，巴拉第決定走海路經西歐回國。10月2日在一名法國使館醫生的陪同下搭船趕往西歐，不幸的是12月6日巴拉第在馬賽因心臟病猝發而溘然逝世。1879年1月2日遺體被運到尼斯，葬在靠近東正教教堂的俄羅斯人墓地。⁹⁶

不用說，巴拉第的一生都貢獻給了漢學研究；更不用說，他的一生永遠和中國及中國文化聯繫在一起。他不但是位國際漢學大師，同時還是位傑出的漢學科學研究組織者。儘管出於職責，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他抱著同情中國的心思一度成為侵略者的幫兇，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他在漢學研究領域，即向俄羅斯人民正確傳播中國文化的功績。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他都是一位值得我們中國人紀念的外國學者。

93 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檔案館，全宗14，目錄2，第117保存單元。

94 國立中央古代文獻檔案館，全宗1385，第1608保存單元，頁27。

95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 М., 1997. С. 291.

96 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主要檔案II-7，1872-1881年，案卷5，頁11、16、29。巴拉第自費在自己的墓地上，豎立了一塊大理石碑，有可能已經不在了。